

農業生產合作社介紹

# 高樓平地起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

## 開 頭 的 話

從蘭州搭上汽車，往西走，經過武威縣，便到了永昌縣。下車以後，騎上個毛驢，再往西走十五里，就到了焦家莊農業生產合作社。

這一帶是河（黃河）西走廊的孔道。連縣不斷的祁連山堵在南面，山頂白雪皚皚，大暑天才消；山前泉水分做四大幹渠，日夜不停地流着，附近幾十里以內的地完全靠它灌溉。北面山色發紅，農民叫它火燄山，也叫北山，山後牧草茂盛，是放羊的好地方。兩山中間，一層一層的梯田上長着綠油油的春小麥、夥禾（“夥禾”是黃豆、扁豆、青稞、大麥等混種在一起的總稱）和胡麻，一眼望不透。就在甘新公路以南，中壩水渠以北，東起下堰溝，西到顏家老溝，在這個近二十里狹長地帶裏的好莊稼，都是焦家莊社裏的。

焦家莊社是一個較大的社，人口現有二百九十五戶，一千四百七十一人；共種着七千五百五十畝地。全社三個生產大隊，十五個生產組。社員住的莊

子大小有二十幾個。

這個社是一九五二年春天成立的。全社統一管理，各組單獨生產，單獨分紅，按組織形式來說，焦家莊社是個聯社。這是和一般社不同的地方。這個社最突出的特點，是沒有經過互助組的形式，由單幹一步走上合作社的。建社之前，農民窮苦得很，識字的人百裏沒一。在這樣薄弱的底子上，合作社能够鞏固、前進，是很不容易的。幾年來，在黨和人民政府正確領導、具體幫助之下，以農業生產爲主，兼營副業，經過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，克服了重重困難，使糧食一年比一年打的多，社員生活一天比一天過的好，基本上擺脫了貧困，走上了大家富裕的道路。

但是，這一段路程是艱苦的。

### 過河困難遇着橋〔附註〕

河西地區本是甘肅比較富裕的地方。但是，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和回奸馬步芳、馬步青的鞭打繩拴、搜刮勒索下，弄得農民挨餓受凍，賣兒賣女，年年苦到頭，落個一場空。永昌焦家莊一帶，更是家破人亡，

路斷人稀。農民“吃飯沒鍋鍋，睡覺沒窩窩”，半輩子眼淚不乾。過去流行的幾句順口溜，就是當時當地人民生活真實的寫照：

家家烟囱不冒烟，  
人人肌瘦臉皮黃，  
姑娘沒有褲子穿，  
娃娃餓得直呱呱。

這樣淒慘的情況，解放初期雖然有了改善，但是，封建地主還踏在農民頭上，殘酷地剝削農民。因此，農業生產不能很快地恢復發展，農民的悲慘生活不能根本改變。

土地改革以前，焦家莊鄉全鄉共有三百二十九戶人，八千七百多畝地。因為地主強取豪奪，階級分化非常嚴重，土地、耕畜、農具，甚至房屋，都高度集

---

〔附註〕 這一節主要說明焦家莊鄉能不經過互助組直接辦社的特殊條件。這是說我們的工作應該從實際出發，應該從羣衆的要求出發；而不是說其他地方也可以不顧實際情況，跳過互助組階段直接辦社。中共中央“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”中說：“在有些經濟和文化比較發達的地方，在羣衆具有合適條件的地方，或者可能不經過互助組而直接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，……這些都是應該估計到的。”焦家莊鄉正是決議中所說的“羣衆具有合適條件的地方”。

中在地主手裏。九戶地主，佔了全鄉耕地百分之六十左右；其中大地主謝殿邦一戶，佔了二千四百多畝，超過全鄉土地的四分之一。地主王二錠子住處的周圍，就有六十多戶人家給他當過雇工，連雇農家的婦女都得給他幹活。農民們住的房屋，也多半是屬於地主的。

全鄉貧雇農佔總農戶百分之七十多，光雇農就佔百分之五十以上。廣大的貧雇農，主要靠出賣勞力熬日月，啥都沒有。

多年來，封建勢力把持水利，渠水是私有的，農民就是有幾畝地，也沒法澆水，只得荒着。在河西走廊一帶，有地沒水，農民比做“有兒沒奶”。因此，佔總農戶百分之十的中農，也只能過着“老牛破車疙瘩繩”的光景。

一九五一年秋天，中國共產黨武威地委會，派專人到鄉裏調查了這裏的階級狀況。發現這裏廣大農民過於貧困，土地改革以後，農民分到土地和一部分牲口農具等，底子仍舊太空，不但沒法生產，就是生活上的困難也很大。農民的困難太大，就是組織互助組也不能解決問題，只有辦農業生產合作社才行。

事實上，這年春天鎮壓反革命運動後，已有二十四戶貧民，開始集體耕種沒收反革命分子的五十來石地（這是一些地方計算地畝的老辦法，就是應產一石糧的地叫一石地）。因為缺乏正確的領導，這個自發的組織，存在很大的毛病。

根據這些特殊情況，地委會決定在這裏一面進行土地改革，一面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。辦法就是在沒收地主土地的基礎上，直接組織合作社，進行集體耕種（入社農民分到的土地，仍歸自己所有，並且得到一定的報酬）。

當時地委分析這裏可以不經過互助組直接辦社的條件有這幾個：

第一，是羣衆條件。農村無產階級（雇農）和半無產階級（貧農）在這裏佔絕對優勢。他們原來大都沒有土地，在地主的大片土地上，由長工頭帶着集體幹活。土地改革如果把成片的土地分割給各戶，他們底子空，生產上困難大，對農業增產不利。因此，他們有組織起來合作生產的要求。他們是黨在農村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依靠力量。中農只佔總戶數百分之十，在封建制度的長期壓迫下，他們的經濟得不到發

展，困難也很多，組織合作社，也會跟着走。

第二，是領導條件。這時農業生產合作社還在試辦階段，黨委有可能派出幹部直接領導辦社。這裏離縣城比較近，縣委會也便於掌握。

第三，是地理條件。這裏原來土地連片，水源充足，集體耕作很方便；而且有大片荒地可以耕種，有發展前途。

唯一的缺點是幹部沒有辦社的經驗，農民對合作社一點也不了解。不過事情是人辦的，困難是可以克服的。試辦農業社的事一經決定，請示上級批准後，中共永昌縣委會，就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初，派出負責幹部前去籌辦。

焦家莊的農民，經過黨的教育，對於辦社的事表示歡迎。現任第六組副組長的焦而泰說：“那時，人都盤算着：你有馱兒沒鞍子，我有犁頭缺犁鏵，這幾家夥分到一頭牛，那幾家夥分了一輛車，湊到一起好使，分開單幹就沒辦法。又逢上十家有八家沒吃的，聽說成立合作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好處，正是過河困難遇着橋，誰不興頭！”這話代表着貧雇農真正的思想，證明當時黨提出辦社的主張，是完全符合羣衆

要求的。

## 高樓平地起

雖然黨決定辦社是從羣衆的需要出發的，但實際進行工作還要經過艱苦的相當長的過程。

開頭羣衆對合作社的意義不了解，思想有些混亂。這個說：“三個和尚沒水吃”，那個說：“蛇多跳哩，人多靠哩”，認爲衆口難調，事情難辦。也有一部分雇農，因爲長期沒有土地，好容易盼望這次能分到土地，單獨成家立業，聽到合作生產，怕土地變相歸公。好多人多年來餓怕了，怕到青黃不接的時候，摘青莊稼，挖個山藥吃，都不能由自己。一般中農和家境較好的人，怕跟大家在一道幹吃虧。他們認爲：“啥也沒有的，參加了好；人強馬壯的，自己幹好。”加上一些壞分子故意造謠生事，有些人也就越發不安了。

說到辦社幹部呢，完全沒有辦社的經驗，對於互助合作的政策了解的不深，自己也覺着困難很多。但是，共產黨員在困難面前是不會後退的。天下無難事，只怕用心人。他們想，只要多請示，多報告，遵從

上級黨的指示，走羣衆路綫，從實際出發，就不會犯大錯。在鄉村幹部忙着進行土地改革的同時，他們緊緊地依靠居民代表小組和積極分子，摸清羣衆對辦社的各種心思，然後針對各種思想顧慮講明政策。

例如農民對於合作社到底怎樣分糧食弄不清楚，頂不放心。有一次，農民蕭光祖、趙永祥說：“辦社好是好，就是怕將來按人頭分糧，一律拉平。”

幹部了解到羣衆有這種誤解，就向他們詳細說明黨的政策，說明共產黨反對平均主義；說明農業生產合作社要定社章，人人遵守；社章要貫徹自願、互利的原則；合作社的收益主要按勞動分紅，並不是按人頭平均分配。這樣一來，大部分羣衆的顧慮打消了，願意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。在十一月份，先後兩批共有二百二十四戶報名入社。

報名的雖說已有農戶的百分之七十，他們對黨對毛主席很信任，往哪裏引，就往哪裏走。但是，有個別的人是抱着吃救濟的觀點入社的，想靠社裏解決眼前困難，等秋後再看，好了幹，不好了散；有的人心裏搖擺不定，光說合作好，就是沒見過。那些沒有報名的人，一時更難說服。

這時，正是冬季灌地時期。十一月下半月，連日大風大雪，氣候突然變冷，澆地的幹渠（中壩水渠）結了兩三尺厚的冰。渠道塞嚴，水不能下流，就在上游的狼舌頭灣冲破壩堰，到處亂流；而下游從小桃灣到謝家西莊子七八里長的地方，有三千多畝地，乾急泡不上冬水。泡不上冬水的地方，正是報名入社最踴躍的地方，渠凍地乾，過年沒法下種，對於來年收成是一個很大的威脅，對於這個新的合作社更是一次嚴重的考驗。

工作同志認為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，馬上和村幹部張國昌、老農尙萬祥等沿渠察看。水渠整整凍了十二、三里，情況嚴重；用棒敲敲，聽聲音，可以打開，還有一綫希望。可是，誰見過打冰澆地啊！有的說：“天這樣冷，渠這樣長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豈是容易打的！”有的說：“人住得七零八落的，少吃沒穿的，腰來腿不來，怎能攢到一起？”幹渠上游何家上莊子以上的人，因為他們的地已經澆好，自掃門前雪，更不願意幫忙。他們說：“打糧他們吃，澆水他們澆，冷月寒天的……”態度十分冷淡。

幹部們批判了聽天由命的思想，鼓勵生產自救，

給大家算了細賬：只要克服困難把冰打開，三千多畝地一澆上冬水，明年至少也可打幾十萬斤糧。又強調集體利益，使大家認識到：天下農民是一家，應該互相幫助，現在既然報名入社了，更應該團結起來，拿出力量，爭取明年豐收，使大家都有飯吃。經過說服動員，原先最不願意打冰的人也想通了，說：“對呀，自己出力不多，大家得益不少。”於是，報名入社的四百多人，編成小組，分段打冰。原計劃三天打通，因為組織得法，心齊力大，不到兩天就打通了，放下水來，把所有應該灌水的地完全泡好。

打冰的時節，冰天雪地，西風像刀子，穿着棉襖也像罩着薄紙。社員陳開昌、尙善學等二十多個人，光着腿跳下水，抬冰修壩，不怕水冷骨頭疼，出力最多，被選成打冰模範。永昌縣人民政府獎了一面錦旗，上面寫的是：“爲發展生產向自然作鬥爭”。這是表現集體力量的第一項成績。

打冰這事，連老人們也從來沒見過。俗話說：“說千遍不如見一遍”，這個地區的農民從這件事上進一步認識了合作生產的偉大力量，信心大大增加。到十二月初，又有四十幾戶報名入社。貧農胡永成一家

子，以前一直堅持單幹，別人多次勸他入社，他都不願意；打冰以後，事實教育了他，他也高興地報名參加了。

另一件吸引農民入社的事，就是生產渡荒。從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初起，已報名入社的農戶，先組織了三個大車組、九個馱駝組、三個人力組，搞打柴、運炭和別的副業，一個月工夫，社員共賺一千七百多萬元（舊幣，下同），等於往年副業收入的七八倍，解決了社員當時的大困難。通過這些事實和細緻的宣傳工作，農民親身體驗到集體生產的好處，動搖最厲害的人也爭取過來了。緊跟着又有一批人最後入社。到這年年底，除過貧農李元善一人一戶靠賣菜過日子以外，全鄉的人都報名入社了。

黨委爲了慎重其事，叫大家很好地考慮，一定要自願才行。同時，同大家研究生產投資和今後生產、管理、評工、分紅的辦法。又經過一個月才醞釀成熟。

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，召開了社員大會，通過社章，焦家莊社正式成立了。會上，中共甘肅省委、武威地委和永昌縣委負責同志都講了話，鼓勵社員搞好生產，把社辦好。在整個西北新區的農民還沒有組織

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時候，焦家莊鄉的農民往前大跨了一步，跳過互助組這一階段，直接組織了三百來戶的大社，真好比一座高樓平地而起。

從此，焦家莊社的農民走上了大家富裕的道路。

## 走過的彎路

春天，各生產組熱火朝天的耕作當中，只有第十二組的生產落了後。這一組社員很多是住在鄉裏的城市貧民，既不會犁，又不會種，對於莊稼活完全是外行；尤其是地主階級分子仇恨農民，多方破壞，弄得這一組幾乎不可收拾。

說起地主，得交代一下。當初建社的時候，大家對地主階級分子的本質認識不清，只以為：把地主弄進來，不光好監視管理，而且便於勞動改造。在經濟方面，又打算從地主那裏吸收一些底財，作為合作社副業作坊的資金，一時麻痹大意，就把全鄉九戶地主都吸收為社員。事實上，地主入社完全為鑽空子，逃避鬥爭。起先，他們甜言蜜語，口口聲聲說“毛主席的政策好”，表面上還規規矩矩的；等到土地改革一

罷，他們認為風浪已過，萬事大吉，就亂說亂動開了。例如第二組破落地主陳之英，是個地道的二流子，做活偷奸耍滑，組長在跟前時應付上幾下，組長一走就不動彈，消極怠工。有一次，他溜糞不往開溜，組長批評他，他竟發起脾氣來：“我們地主做啥，你們看着都不順眼。”開小組檢討會時，他不但不認錯，反而更加猖狂：“反正我只有一個頭，看你們怎辦就怎辦！”另外幾戶地主和他差不多，有種子誰也不往外拿，做活也不賣力氣，常常搗蛋。

十二組的地主分子，更是惡劣，下種時本來該下八升種子，偏下了一斗二，稠得光長了稈稈；平常笑裏藏刀，挑撥離間，一心要把這一組搞垮。其中地主分子謝景安表現得更是毒辣、露骨。

謝景安自從參加第十二組以後，面子上裝得很乖，故意把組長叫“組長老爺”，把社員女代表叫“代表太太”。組裏分工的時候，會趕車的人少，也把他分配了這個工作。可是，這傢伙骨子裏是另一回事，因為他父親、叔父罪惡多端，鎮壓反革命時被槍斃了，他常懷恨在心，暗暗破壞。有一天，社員趙永祥看見自己的馬走路不得勁，質問他趕車時怎麼把牲口使

壞了，他竟敢說：“你分的馬就是這號走獸。”趙永祥一想，這傢伙的話裏有話，細一追究，才知道他趕車時，故意給馬套了個大套包子，把馬腩子打得稀爛，不能做活了。社員警告他，他不但不改，不久又把謝鴻禮的騾子趁着駛車的機會任性鞭打，差點兒打死。說什麼“有了騾子給這些窮鬼分呢。”說話行事處處和農民爲敵。社員忍無可忍，請行政上把這個地主分子送到人民法院法辦。

經一事，長一智，全體社員的階級覺悟大大提高了。在四月底，合作社把所有的地主分子都開除出社。這一下才把壞根子除掉。第三大隊別的三个組，看見第十二組受了地主分子的暗害，生產沒趕上，趕快抽了十幾個人、十幾條牲口去幫忙，才算把莊稼種好。至於社裏的兩戶富農，比較守法，已放棄剝削，靠勞動生活，而且組裏的幹部較強，請示上級黨委後，暫留在社裏改造。

把地主開除出社以後，社員生產的情緒比較穩定了。不過，黨支部又發現好多社員生產的勁頭不太飽滿，有多報種植面積和勞動日的事。當種完麥子種粳禾時，情形更不好，有的組有糞不往地裏上，有的

社員十分疲沓，“推日頭下山，兩半日子一天”。

問題的根源在於分紅的單位太大。社成立以後，全社設立管理委員會作為社的領導機關，並根據有利團結、生產需要、居住情況和領導方便等原則，社以下分三個生產大隊，十五個生產小組。又確定以各大隊為分紅單位。各大隊分紅，為的是使各隊統一經營土地，統一調配人畜力，發揮更大的力量，發展生產。但是，社的領導忽略了地區遼闊、各組土質不一、生產條件不同等情形，執行起來，毛病就出來了。各組社員普遍存在着消極和依賴思想。好多人想，反正打下糧食幾百口人分，輪到自己跟前，還不知道有多少一點點，做活何必賣那麼大力氣！各組又互相不了解情況，互相猜疑：這一組嫌那一組下的工本小，活做得粗糙；那一組又懷疑這一組工分訂得高，勞動日多。他們說：“大隊分紅好像隔山叫羊——摸不着底。”總之，都怕自己吃虧。趕到種胡麻時，這種矛盾就表現得更突出。第六組的人乾脆不想種了，管理委員催誰，誰也不動。社員王德禎說：“打下糧食各組分哩，種上還不是便宜別人！”第九組不光好多社員把組裏的活丟下不管，去搶種個人的山藥，就是副組長